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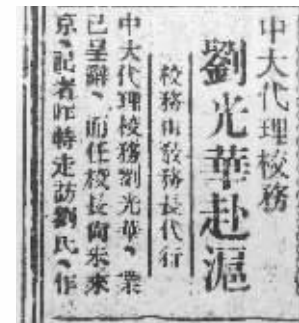
1931年6月18日

历史上的这一周

中央大学代理校务接受记者采访吐苦水;其实,还有比他更苦的…… 中央大学校长:民国最难当的“官”

1931年6月18日,《中央日报》的记者采访了时任中央大学代理校务的刘光华。次日,该报刊登了以《中大代理校务刘光华赴沪》为题的报道。这则不足400字的简短报道,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——民国时期,中央大学的校长不好当,这个在今天看来大红大紫的职位,当时却是烫手山芋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



1931年6月19日《中央日报》相关报道



朱家骅



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大门

侄子遭绑架, 中央大学代理校务要辞职

1931年6月19日,《中央日报》刊登的这则消息,简单报道了记者6月18日采访中央大学代理校务刘光华的情形。

刘光华是湖南人,少年时代考取官费留学日本,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。刘光华回国后,先后在广东、湖南、福建等地任教。1931年,朱家骅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后,刘光华被聘为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,后担任代理校务。

从报道中看,记者采访之时,刘光华已经提出辞职。刚刚担任代理校务不久,他为何要辞职呢?刘光华告诉记者,原因是“本人因家遭劫匪”。原来,他家中遭到抢劫,侄子被绑架,事发后,他本打算回湖南老家,办理善后事宜。无奈,此时,正值学校期末,一堆校务要处理,行程就被耽搁了。刘光华一面将校务交给教务长打理,一面连发电报催促“任校长”来南京就任。从刘光华的表述看,这位“任校长”刚刚被委任为中央大学校长,他希望,新校长到任后,能当面交接一些重要工作。无奈,“任校长”那边,一直没有给出上任的具体时间。

虽然新校长没有给出就任时间,但刘光华通过各方渠道打听到,6月20日,“任校长”就要来南京了。而由于“舍侄被绑,迄未脱险,不能久悬”,他决定结束中央日报记者采访当天,先行赶往上海,设法营救侄子。

教职员薪水发不出,朱家骅请辞校长

《中央日报》报道没提名的这位“任校长”,指的是任鸿隽,是我国著名学者、科学家、教育家和思想家。从刘光华的表述来看,任鸿隽被任命为校长后,似乎是有意推托,迟迟不肯上任。其实,任鸿隽的拒绝就任,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。以今天的眼光看,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高等学府之一,校长一定风光无限。然而实际上,如果回顾那段历史,却发现,彼时的中央大学校长,堪称中国最难当的“官”。

中央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东南大学,而国立东南大学,是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。1928年,学校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,首任校长是张乃燕。张乃燕上任伊始就地位不稳,再加上学校正处于教育体制改革阶段,发展陷入胶着状态。张乃燕就任后,很难处理好与学生以及教职员的关系,处处掣肘。他先后三次请辞,最终由朱家骅接任校长。

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朱家骅,上任后显示出铁腕治校的决心,一方面着力整顿学风,另一方面努力改善学校与教授的关系,还聘请一批知名教授执教中大。朱家骅还努力提高办学条件和教职员及学生待遇。尽管他苦心经营,然而,由于种种原因,他的改革还是举步维艰。其中,让朱家骅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,就是办学经费短缺。1931年春夏之交,江苏发生大水灾,经费更

为短缺。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议决每月停发中央大学经费5万元,朱家骅虽力争而无果。中央大学经费仅靠财政部每月5万元勉为维持,教职员薪水一直拖欠。经济危机,加上校内繁复的人事纠葛及时局变动,时时打击着朱家骅的热情。未撑到学期末,朱家骅便提出辞职。

任鸿隽不肯接任,随后14个月换了N个校长

朱家骅辞职后,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刘光华担任代理校务,处理学校事务。与此同时,经过筛选,各方满意后,任鸿隽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。然而,似乎唯独任鸿隽本人对这个任命不满意,迟迟不肯赴任。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,刘光华家中遭遇变故,焦头烂额的他打算趁机身退。

而根据《中央日报》的报道,截至6月中旬,拖欠中央大学教职员工的薪水,已经开始补发,“原欠三个月,现已先后发放半个月”。在采访中,刘光华乐观地表示,“且目前已至麦秋时节,收数当大非昔比,随收随发,不成问题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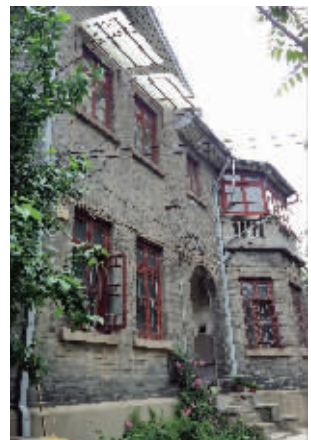
照这个说法,最令校长头疼的薪水问题迟早能解决,因此做校长的难度系数也会降低很多。不过,另一个事实是:任鸿隽拒不赴任后,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,先后有桂崇基、刘光华、段锡朋、李四光等人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或代校长。直到1932年8月26日,罗家伦被任命为校长,中央大学这才有了真正的“一把手”。

民国建筑

珞珈路48号 气象学家竺可桢旧居

珞珈路,颐和路片区的一条小巷。之前,我们在那里探访过民国政要毛人凤(珞珈路3号)、汤恩伯(珞珈路5号)的旧居。在这条小巷的另一头,珞珈路48号,还藏着一幢名人旧居——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家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文/摄



珞珈路48号竺可桢旧居

藏身居民大院之中

珞珈路48号是一个居民大院,里面分布着高高低低的房子,如果不是门口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,你不会觉得这个院落有什么与众不同。

走进院子,目光自然就会投射到位于中央的一个二层小楼上。这幢房子是西式建筑风格,青灰色的墙砖呈现古朴,木质红色窗框点缀其间,使色调明快起来。房子入口有一个拱门,门前有几级台阶,加之住户们摆放在门前的鲜花,再配上周围绿树的掩映,小楼又有了几分田园风光。

这幢小楼正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南京的旧居。1965年,竺可桢把这处房产捐给了国家,现在这里是民居。

一砖一瓦建成南京北极阁气象台

提到竺可桢的名字,南京人是很感佩的。著名的北极阁气象台能够建成,竺可桢功不可没。

那是1927年,竺可桢在国立中央大学担任地质系主任,受蔡元培邀请,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

究所,并担任所长。竺可桢对气象研究所倾注了极大心血,带领同事们亲手建楼铺路栽树,亲自接自来水,一砖一瓦建成南京北极阁气象台。1930年元旦,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,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,这是中国人独立自主预报天气的开端。在南京期间,竺可桢就居住在珞珈路48号。

竺可桢在南京主持全国气象学研究所,他在北极阁的古气象台旧址上,修建了一幢新型办公楼,用于科学气象研究。这幢建筑从前看是江南民居风格,从后面看则是传统宫殿风格,而从南北两侧看,则是高低起伏的马头墙,呈徽派风格。竺可桢就是在这里办公并从事气象研究的。

1936年,竺可桢调任浙江大学校长,在浙大精心耕耘13年。1949年,国民政府撤到台湾,竺可桢留在了大陆。他被任命为新创立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(中科院院长当时为郭沫若,副院长为陈伯达、李四光、陶孟和、竺可桢、吴有训)。1955年,竺可桢当选为新中国第一批科学院院士。此后,他还陆续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,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,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。

南京微史

朱元璋狠揍茹太素

《明史》里有段很有意思的记载,今天读来还让人会心一笑。

1376年,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交了一份报告,长达17000字,朱元璋看得眼花,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,都念到6300多字了,还不知道要说啥。朱元璋实在受不了,当场找人把茹太素狠揍了一顿。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,从第16500字到结尾,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,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,朱元璋采纳了其中四条。

事后,朱元璋表示:当大臣不容易,当皇帝又容易吗?我需要的是接地气、解难题的意见建议,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,茹太素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,真耽误事。

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。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,作风确实简单粗暴,但了解背景后,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。

朱元璋定都南京时,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,内外形势都很严峻:社会经济凋敝,土地不均,农业基础设施阙如;饥民遍野,人口数量下降;各派不兴,社会无法正常运转;矛盾尖锐,官民冲突时有发生;退居塞北的残余势力企图卷土重来,蒙古鞑靼、瓦剌各部日渐强大,虎视眈眈。特别是进城之后,明政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,不思进取,各派

人马争权夺利,贪贿成风。官风虚头巴脑,政权在文牍中空转。总之,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,随时可能夭折。

朱元璋忧心如焚,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许多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整顿和改革。就在狠打茹太素这年,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,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,设“三司”分管行政、军事和司法,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。

朱元璋借鉴汉初经验,实行轻税薄赋、与民休息的政策,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,创新惠农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。在打击贪腐方面,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,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,明初吏治因此稍微清明,政权的合法性迅速得到社会承认。

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,在改善文风、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。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,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,“颁示中外,使言者陈得失,无繁文”。他自己也身体力行,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,干脆就是口语,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。

“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”,史鉴凿凿。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、紧迫感、紧迫感的官员,遇到有抱负、真干事的朱元璋,不挨揍才怪! 习骅